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 (Torbjørn L. Knutsen) 著
余万里 何宗强 译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责任编辑 / 王 康
封面设计 / 王 玲
版式设计 / 丁桂发

这本著作以它的宏大和通俗确立了在这个领域的范本地位。

——《欧洲国际关系季刊》

很多研究生都能够通过他或她的国际关系理论考试，只要她能够把这本书铭记在心。本科学生迫切需要历史和理论的视角。

——《选 择》

托布约尔·克努成介绍了从中世纪到当代的诸位思想家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并围绕战争、财富、和平和权力这四个恒久不变的主题追述了其发展的过程。

这本书对国际关系无理论传统的看法发出了挑战，并展示了七百多年来学者、士兵和政治家们在这一领域的思想成果。从中世纪国家和主权概念的起源开始，作者汲取了无数杰出思想家的精髓。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到黑格尔、卢梭、马克思，以及当代思想家，如伍德罗·威尔逊、列宁、摩根索和华尔兹，这些人都对20世纪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修改和增补之后，本书的最后部分还介绍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最新进展。

托布约尔·克努成(Torbjorn L. Knusten)是挪威特伦海姆大学的国际关系学副教授。

ISBN 7-201-04436-2



9 787201 044361 >

ISBN 7-201-04436-2 定价:4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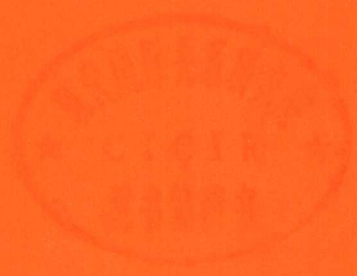


U00
F01
032

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 (Torbjørn L. Knutsen) 著
余万里 何宗强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12.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 / (挪) 克努成著; 余万里, 何宗强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书名原文: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SBN 7 - 201 - 04436 - 2

I. 国... II. ①克... ②余... ③何... III. 国际关系理论 - 研究 IV.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8447 号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y Torbjørn L. Knutsen

Copyright © Torbjørn L. Knutsen 1997

First edition 1992

Second revised, expanded edition 1997

Published b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Road, Manchester M13 9NR, UK

and Room 400, 175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 10010, USA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 - 2001 - 278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2 插页

字数: 400 千字 印数: 1 - 4,000

定价: 40.00 元

第二版序言

本书的第一版完成于1991年的夏天,书稿是在8月中旬邮寄出去的。当稿件到达出版商手里时,一系列事件改变了国际政治的面貌。8月19日,一群人动摇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权,使鲍罗斯·叶利钦赢得了威望和政权,并摧毁了苏联共产党的根基。这一斯大林式的政党的解体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这些事件结束了冷战。它们也废弃了很多关于国际关系的教科书,这些书过分沉溺于冷战和全球共运的概念和事件从而使自己在那个秋季学期就过时了。因此,当出版商邀请我准备本书的第二版时,我十分乐意借这个机会来替换前一版的结论部分。原先的想法是提供一个新的章节,以便追述三大传统范式——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在冷战后的衰落,然后介绍更新、更丰富的理论。然而篇幅制约了这个设想。结论部分的第一个修改稿变成了冗长的名字和观点列表,显得不堪重负。最后,出于可读性的需要,我不得不从这一章中删去很多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其中很遗憾的包括女性主义(Grant and Newland 1991; Sylvester 1994)、第三世界理论(Ngugi 1986; Gordon 1989)及关于东方主义(Said 1987; Howard 1995)的争论、民主和平论(Russett 1993; Gates et al. 1996)、规范理论(Frost 1986; Nardin and Mapel 1993)、生态主义(Sprout and Sprout 1965; Vogler and Imber 1996)等众多国际关系学界的“时代新锐”。

新的结论需要新的开头。大概是为了印证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格言,结论部分关于冷战后世界事务的讨论引发了开头部分对中世纪政治的重大修改。新的第一章比原来的更长,但重点更加突出、结构更加清晰,这两个方面共同保证了叙述的简洁。同第一、第十章的大改相比,其他章节只略微作了增删。

正是在无数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下,我才可能饱览那些古老的文献——其中我尤其感谢特伦德海姆大学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我的写作还得到了同事们的耐心帮助,他

们评阅了我的修改稿。我要向他们表示特别的谢意:Jennifer Bailey, Erling Berger, James Der Derian, Yale Ferguson, Scott Gates, Nacem Inayatullah, Mark Katz, Jonathon Moses, Iver Neumann, David Phelps, Georg Sørensen, Silk Vogel。当然,如果没有特伦德海姆大学这些出色的学生们的热心和疑问,这本书也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我并不总是同意他们提出的批评。我可能听取了某些意见而忽略其他意见,这不过是因为没有人能承担出版后的责任,只有我自己来承担。不过,在我接受批评并努力把自己的观点表述更清晰之后,我能够更有信心地承担起这个责任。

托布约尔·克努成
1996年8月,特伦德海姆

中译本序

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同其他议论、阅读和撰写国际政治的人有什么区别？我认为区别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区别是“方法”。专业的学生用方法论为自己压舱，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获得特定科学技术哲学和学术规范的指导。第二个区别是“理论”。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能自觉地沿着一条前人已经走过几个世纪的道路来探究战争、财富、和平和权力问题。

本书的首要内容就是理论。它试图把过去的学者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已经完成的众多系统方法中的一部分传达出来。因此，这也是一本某种类型的历史书。它表现了一些方法在不同时代的演化过程和途径。同时，它试图让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熟悉本领域的某些基本事实——国际事件、政治行为者、国际机制等等。不过，它最主要的是想传递一套在不同时代都共通的国际政治观念。因此，它不仅仅是一本有关理论的书，而是一本关于理论变迁的书。它是一本关于理论兴亡的书。它描述了理论产生的社会环境。它探讨了理论演变和转型的途径。它讨论了这一演变过程如何影响政治观念、塑造政治决策——而这些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环境并导致某一理论的繁荣（或其他理论的衰败）。

焦点与偏见

对于一本关注面如此广泛的理论和历史书来说，设定一个清晰的焦点是必要的。本书选择的焦点是现代领土国家。把学术视点集中在领土国家的演变之上，本书试图把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描绘成一个在不同时代波澜起伏的连续过程。这个焦点使追述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成为可能。它也有助于将 20 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归纳为三个基本的方法论类型：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

不过，在选定这个焦点的同时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尽管它有助于从

时间的角度追述国际关系思想的演变,但很难从空间的角度归纳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在聚焦于现代领土国家的同时也就限制了讨论的地域范围,因为领土国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国际行为体的出现是在西方。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本书成为欧洲中心主义。本书描写的国家主要是传统的欧洲强国,而涉及的理论也是西方学者创造的。

我本来并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想的只有欧洲的读者。它试图抗衡来自美国的众多教科书,它们已经统治了国际关系研究将近半个世纪。

现在,这本书将出现中文版,它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将暴露无遗。然而,这本书在中国也可以作为美国视角之外的一个选择,美国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覆盖了全球。本书的欧洲视角或许还能在中国读者中引起有益的辩论,尤其是针对书中有争议的关键论点:现代领土国家是起源于欧洲的特殊社会形式吗?

本书认为,现代国家起源于西欧,最早的现代领土国家是出现在欧洲西部沿海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英国。它们出现在欧洲中世纪的后半段——在 11 至 14 世纪间。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国际政治只是发生在这些西欧国家之间的现象。在 19 和 20 世纪,领土国家的观念和国际关系向世界其他部分扩展,欧洲的国际体系成为世界其他地方国际关系的蓝图。不管是好是坏,现代欧洲的国际关系奠定了当今民族国家的组织和互动模式。

是什么东西使欧洲的国家观念如此强大,并使欧洲的国际体系如此具有渗透力?

西欧的国家

在讨论问题之前,应该指出欧洲并不总是很强大。在公元 1000 年左右,欧洲是一片分裂的、冲突的和贫困的区域(如第一章中指出的那样)。“西方”社会同它两个庞大的邻居——东南方的拜占庭帝国和南方的伊斯兰帝国——相比,总体处于贫穷弱小的地位。当然,欧洲也比同时期的中国贫穷弱小很多,中国在公元 800 至 1100 年就出现了工业;贸易扩张、经济繁荣、人口增加;首都杭州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城市。但是,13 至 14 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尤其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变革推动了欧洲财富和实力的增长。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革呢?

国家的重要性

从国际关系的观点看,最重要的变革是现代领土国家的出现。正是这一类型的国家使西方变得与众不同。这是因为,这种类型的国家很快被证实为非常有效率的社会组织形式。在19世纪,似乎没有别的社会组织形式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有效地动员国家资源、协力创造财富和力量。领土国家的效率主要来自它的四项组成要素:领土、主权、机制和人民。

第一项要素,“领土”,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新鲜之处。哪个国家不是领土的实体,都在地球的表面上占有特定的有形的区域?古希腊的城邦和帝国难道不是领土实体?它们当然是。不过,西方国家的领土基础在后来变得模糊了——先是罗马帝国,然后是封建主义。^①只有当中世纪晚期,欧洲君主成为西方的主要世俗统治者之后,政治权力再度立足于轮廓清晰、界线分明的土地。从14、15世纪往后,欧洲国家的领土性质不断得到强化。

第二项要素,“主权”,标志着国家的领土性质得到了自觉的强调。正如15、16世纪的思想家和律师们所分析的那样,主权意味着完整和绝对的权威:主权统治者必须得到服从,因为他拥有绝对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断言,所有稳定有序的国家都拥有主权统治者。不过,在16世纪,主权的观念在西方获得了特有的解读:它似乎具有两面性。一是领土的国内方面,它涉及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纵向契约。这其实不是一个新现象。古代的传统观念认为,国内存在一个完整、绝对的权威核心,所有合法的政治指令都发源于此。这关系到了国家内部的上下级关系。^②二是在16世纪兴起的主权的对外方面。它涉及享有对内主权的统治者之间的横向契约。布丹(1967, p. 29)称之为“条约”,并解释君主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代表。主权的对外方面构成了西方特有的新现象,意味着对多数国家地位的承认。它还承认所有

① 罗马帝国皇帝把自己看成天下的统治者——在某些情况下类似中国皇帝自称的“天子”。公元3世纪,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把基督教介绍到帝国,并借用基督教会的普世主义原则为他的政策辩护,在这以后,君临天下的观念进一步得到加强。在罗马衰败之后,基督教会的普世主义是在动荡的欧洲世界中提供统一和秩序的少数机制之一。在11世纪,封建制度成为另一个统一和秩序的来源,不过,封建秩序并不是基于领土的秩序,而是以错综复杂的社会效忠网络为基础的。本书第一章对此提供了详细的分析。

② 亚里士多德在他最重要的著作《政治学》(写于公元前3世纪)中界定了主权的观念,直到现代,他的定义仍然影响着西方的政治和法律学说。在定义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政府:君主制(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主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贵族制(主权掌握在一小群杰出人物手里)和民主制(主权由大多数或全部人民掌握)。亚里士多德的三大基本政府类型至今深深扎根在西方政治和法律讨论之中。

这些国家享有领土不受侵犯的平等权利。它认为所有国家都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至少在名义上)建立相互关系,这个观点奠定了现代外交关系的基础。^①对外主权的观念可以用“独立”一词来概括。当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讨论主权国家的时候,它们所指的就是独立国家。^②

第三项要素,政府机制,指的是国家的官僚机构。在这当中最重要的是武力机关。它构成了任何国家稳定的核心——西方和中国的思想家早在数世纪前就已经指出了这点。^③ 由于维持军事机关的成本巨大,任何成功的国家都必须建立相应的中央税收机关。很显然,军事机关和财政机关是任何国家都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机制。在此之上建立的其他机制造就了西方国家独特的效率和力量。这些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国债和代议机构(“国会”)。建立这些机制使现代领土国家拥有了高效率的手段,从而使它们能够集中和协调大众的能量和价值观,并转化为国家实力和军事力量。同样,这些机制似乎也有利于经济 and 产业的发展;而经济和产业的恰当平衡对于荷兰和英国在 16、17、18 世纪的兴盛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④

“机制”的概念近年来拥有了更加广泛的含义。在当代政治科学中,机制概念超越了旧的官僚组织和机关的范畴。今天,它包括决策者在统治过程中采取的规则、规范和价值观。这一新的机制主义涉及了现代国家的第四项组成要素:“人民”。人民最直接的含义是主权领土上的居民。它应该

① 国家权利平等的观念与法国人传统的“普世君主”和中国人的传统“皇帝”概念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生动地反映在发生于 1793 年 9 月 14 日的一幕场景中。当中国皇帝乾隆庆祝他成为“天子”之后 57 岁生日时,三个外国代表团前来向皇帝表示敬意。其中的两个国家,缅甸和蒙古,是已经接受了中国主权的邻国。而第三个国家,大英帝国,被认为是代表“西洋的王国”来接受中国的主权。而英国代表团关于主权以及英国同皇帝关系的观念完全不同于缅甸和蒙古,于是出现了一幕尴尬的局面,英国代表团头领乔治·洛德·马嘎尔尼在上朝时拒绝向皇帝磕头。认识到这一区别十分有意思,缅甸和蒙古代表团的举动代表了传统(纵向的)主权观念,即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而英国代表团的行为反映了西方(横向的)多元化、平等的主权观。马嘎尔尼似乎很难让中国皇帝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即伟大的东方陆上强国中国与伟大的西方海洋强国英国在政治上是平等的。(见 Peyrefitte 1989, pp. 70ff)

② 现代主权概念的主要阐述者是法国人让·布丹,关于他在第三章中有详细的介绍。

③ 在中国思想家中,公元前 3 世纪的商鞅、孙子已经涉及这一点。一个世纪后的韩非子认为,只有国内安定的统治者才有能力向外投射力量。在欧洲,论述这一问题的思想家俯拾皆是,如佛罗伦萨的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见第二章)。普鲁士哲学家高特弗里德·W. 莱布尼兹值得高度重视,因为他把军事结构同主权概念联系了起来(见第三章)。在 15 世纪向 16 世纪过渡的时候,现代军事机制(莱布尼兹所提及的)被引入欧洲,更确切地讲,是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主要是为了适应以火药为基础的新式武器系统。中国士兵几百年前就已经使用了火药,但不同于欧洲人的是,他们从没有将它发展成大规模的武器系统。

④ 在其他著作中讨论了这个问题(Knutsen, 1999; Ferguson, 2001)。这里,只要注意到这些机制的发展对于政治事件,尤其是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影响就够了。它们不是为推动经济发展而创建的,它们的出现只是为战争征集赋税。

是这四项要素中最简单的一项。然而,事实上它是最复杂的一项。其复杂性在于,“人民”不仅仅是居住在领土上的人类的简单总和。领土国家中的居民是通过一些共同的观念团结起来的——共同的信仰体系、共同的语言或共同拥戴的国王以及国王在领土内实施的共同法律。在一个建设完善的现代国家里,必定能在国家政治认同的心脏部位找到某种与众不同的观念。正如我在别的地方指出的(Knutsen, 1999),这一核心观念提供了国家的根本“神话”。

观念的重要性

在很长时间里,这一神话是由宗教来提供的。基督教在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将君主和上帝联系了起来。这一神圣的关联告诉百姓,君主的决定代表着上帝的意志。这一以神的原则为君主权威提供合法性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论。君主是主权者,他的主权来自上帝并得到上帝的支持——而他的民众也沐浴着上帝的恩惠。^①

进入18世纪之后,君权神授论被对立的理论所取代。经历启蒙时代后,上帝失去了他在西欧的光环。当神权失去其说服力之后,它为政治提供合法性的功能也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启蒙主义的人民主权论。根据这个新理论,君主仍然是主权者,但他的主权不再来自上帝,而是来自居住在他领土上的人民。当然,这个理论还具有更加深远的含义。如果人民失去了对其君主的信任,那么君主就不再拥有主权。他因此可以被替换。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几次伟大的社会革命中得到十分清楚的表现。在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君主失去了他的权力或被推翻。^②

所有这些革命都从两个相关的观念上向君权神授论发起了挑战:人民主权论和人权观。这两个观念对西方市民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大众参与国家的决策过程,这个观念改变了社会的政治向度。根据公民拥有言论和结社权利的观念可以预见大规模群众政治动员的出现,这个进程还伴随着政治传播渠道和大众参与机制的演变。最重要的两个大众参与机制可以用“民主”和“民族主义”这两个名词来概括。它

^① 在这一点上,17世纪的欧洲同中国没有什么区别。中国的皇帝也从“天命”中获取统治的合法性。

^② 可以认为,稍后还发生在1917年俄国革命和1911年辛亥革命的过程中。

们是一块政治金币的两个侧面。它们都源自欧洲的启蒙运动并且依据一个共同的基本概念:人民的意志应该在国家政策中获得反映。这两个机制同时出现在18世纪后期的西方政治舞台上——尤其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过程中。^① 它们在19世纪相互支持,并随着20世纪普选权和直接参政权的扩大而获得快速的发展。^②

另一方面,大众参与国家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这个观念改变了社会的经济向度。从私有财产权中可以预言大规模的群众经济动员的出现,这个过程伴随着市场的发展——商品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里,西方列强把市场机制带进了世界舞台——尤其是英国的工业革命。^③

西方的作用

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动员,无论是在社会的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引发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巨大的变革。它进一步加强了西方国家的实力。它动员群众,使国家更加富有和强大。它同时也掀起了西方扩张的浪潮,表现为19世纪末期的帝国主义政策。

从国际关系实践的观点看,西方政治的独特之处在于现代领土国家的出现——连同其高效的体制和群众动员。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看,西方最重要的特性是主权观——更确切地说是对外主权。主权虽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但它的抽象性和学术性并不强。在17世纪早期,这一概念被列入国际法。^④ 从那以后,主权在诸多重要的方面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了影响。

随着国际贸易、国民银行、民族工业、国家神话、国民议会以及国际法在19世纪的持续发展,西方开始向全球扩张。这个扩张既包括西方士兵和商

① 见第六章关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讨论。

② 在20世纪,大多数西欧国家都采纳了人民主权原则并发展出一套自由民主的代议模式——这套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个人人权观,尤其是言论自由和私有财产权,主要形式有代议制、多党制和定期的自由选举。中南欧的一些国家发展出社团主义模式的人民主权原则,其极端表现是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法西斯主义——党制,强调国家的集体利益。西欧以外的一些国家还发展出共产主义模式的人民主权原则——党制,压制个人财产权,强调工人阶级的集体利益。20世纪的历史从西方世界的观点看,就是一场持续的斗争,发生在落实人民主权原则的这三种途径之间:自由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Barrington Moore, 1966)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场斗争是三角的:表现为自由的西方(以英国和美国为首)、共产主义的俄国与法西斯德国之间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灭亡,于是战后时代就体现为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自由市场的自由民主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的冷战。

③ 第六章开头简单回顾了 this 演变过程。

④ 第四章开头关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讨论包括了这一进步的过程。

人在全球的扩散,又包括欧洲领土国家的高效社会模式向全球其他地区的扩展。到公元 1900 年左右,整个世界都在西方强权的控制之下。欧洲列强占领了各大洲——美洲、非洲、亚洲。国际关系涵盖着一个不断成长的贸易和交换网络。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一场大转折的发生。政治上,西方体制在一战后继续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① 经济上,一战导致了西方体系的破产。它意味着历经 18—19 世纪精心设计的国际相互依赖网络彻底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年)严重破坏了很多国家间的贸易关系。紧接而来的世界经济衰退(1933—1945 年)导致了民族主义和国际经济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年)再次导致了国际贸易的解体。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带来了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一转折开始于 1942—1943 年,美国邀请它的全体战时同盟参加了一系列的大国会议,为新的世界秩序设计了基本构架。到 1944 年末,这一动议产生了未来国际政治的蓝图,联合国以及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些机制推动了自由贸易以及国际冲突的和平解决。在它们的作用下,世界上的国家变得越来越一体化和相互依赖。到 20 世纪末,世界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国际关系可以被看做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各种社会力量在一个日益一体的空间里相互发生联系。地球村的观念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政治的运作和组织。

结 论

在 21 世纪的开端,过去 400 年的世界事务可以概括成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国际化,其根源来自“漫长的 16 世纪”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建立。在这个阶段成立了第一批向全球扩张的特许经营公司——如荷兰的东地中海公司(1581 年)、东印度公司(1602 年)、西印度公司(1621 年)。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欧和东欧的最后几个帝国崩溃了:奥匈帝国分解为几个小国;奥斯曼帝国也被解体,它的几个欧洲部分被打着国联旗号的英国和法国吞并为保护地;俄罗斯帝国崩溃后,由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革命政府重整这个大帝国并维持了 70 年的统一。在亚洲,中华帝国继续存在,但已经名存实亡:在战争中,各省的权力掌握在军阀手中,并持续不断地发生内战。在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中诞生了一批激进的中国领导人——其中一些人是在欧洲加入了共产党(如朱德和周恩来),他们用激进主义的观点(反帝)来理解世界经济、国际关系以及领土国家及其政治体制。

第二个阶段是跨国化,其动力在 19 世纪的工业化。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世界范围的资本、劳动力和金融安排。跨国化的浪潮在 19 世纪末期达到了高潮,接着便遭受金融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最后一个阶段是全球化,发生在 20 世纪的最后 25 年,是在一场真实的电磁通信技术的微型化的革命中诞生的。

每个阶段都带来了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和地理空间的缩小。抽象地讲,这三个阶段体现了我们全球通信能力的不断提高和传统空间障碍的不断降低。具体地讲,这一过程包括了技术、市场和政治领域的一系列进步,从而使地理距离越来越小。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能够进行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联系,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经济行为体能够使用新的技术和市场实现投资的国际化,并在全球范围内协调生产和销售战略。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相互依赖。

这就是大多数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历史的看法。作为一本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观点的著作,这本书或许是有用的。然而,如同新近出版的一些著作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的视角不能代表全部。我十分欢迎非西方的读者能够提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观点。例如,中国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吗?在哪些方面,中国的传统与众不同?如何解释这些关键性的不同之处?^①

托布约尔·克努成

2001 年 10 月 31 日

参考书目:

- Feiguson, Niall(2001). *The Cash Nexus*. London: Allan Lane/Penguin
- Knutsen, Torbjorn L. (1999). *The Rise and Fall of World Order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Peyrefitte, Alain(1989). *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 Paris: Fayard

^① 第一章指出,理解欧洲政治的钥匙是中世纪,当时的欧洲没有发展成一个帝国,而形成了由若干独立国家组成的独特体系,这些国家在以军事为基础的外交以及均势政治中始终维持了自己的独立。在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均势体系带来了欧洲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地位。第一章说明了欧洲的多国体系如何不同于它周围的两个帝国: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帝国。或许还应该加上西方同中国的区别,尽管 9 世纪的欧洲同中国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在欧洲,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在混乱中缓慢诞生了一个由很多国家组成的多国体系;在中国,唐朝灭亡后也出现了一个由十国组成的多国体系。不过,欧洲与中国的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了。当欧洲的多国体系因为主权原则和均势不断巩固之际,中国重建了一个帝国,宋王朝统一了中原和南方诸国。

目 录

绪论:为什么写国际关系理论史?	(1)
第一部分 序 曲	(9)
第一章 上帝、罪人及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源	(11)
西方世界的衰落和兴起	(12)
中世纪的三大文明	(16)
西方政治理论的源头	(22)
中世纪知识的演变(革命)	(29)
西方的特殊背景	(33)
第二章 现代世界的根基:文艺复兴时期的国际政治	(36)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	(36)
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与政治	(39)
马基雅维里:在美德和自利之间	(43)
圭恰迪尼:权力的记录者	(46)
结论	(51)
第二部分 近 代	(57)
第三章 枪炮、战舰与印刷术:16 世纪与现代世界的诞生	(59)
社会创新、经济变革与政治权力	(60)
转折的时代	(64)
16 世纪的两大理论源泉:西班牙与意大利	(68)
主权的概念化	(74)
本世纪的理论风貌	(79)

第四章 专制政治:17 世纪与国际体系的发育	(85)
军队、宽容、税收与三十年战争	(86)
领土国家	(92)
无政府、理性、契约与秩序	(96)
托马斯·霍布斯:“恐惧的孪生兄弟”	(103)
霍布斯与 17 世纪的欧洲政治	(108)
本世纪的理论风貌	(110)
第五章 启蒙主义政治:18 世纪与人民主权的兴起	(117)
权力与财富的变迁	(118)
对称、主权和理性崇拜	(120)
关于国际关系的思辨	(124)
让·雅克—卢梭:先知的困惑	(131)
本世纪的理论风貌	(141)
第六章 意识形态政治:19 世纪与大众参与的兴起	(149)
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革命	(150)
社会思想的革命	(152)
意识形态与世界政治	(153)
最后的集大成者	(167)
本世纪的理论风貌	(170)
第三部分 现 代	(181)
第七章 中间曲:国际关系理论的现代转型	(183)
民族主义	(184)
工业主义	(188)
帝国主义	(191)
达尔文革命	(195)
现代性及其超越	(203)

第八章 两次大战间的政治学:20 年危机	(206)
永久和平的两种观念	(207)
20 年危机	(212)
国际关系学:年幼的学科	(215)
两次大战之间的学派	(218)
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新世界的轮廓	(228)
第九章 冷战政治: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学	(235)
从世界大战到冷战	(236)
分裂世界中的国际关系	(239)
在无政府状态和(相互)依赖之间	(244)
国际关系理论的三种基本范式	(257)
结论	(262)
第十章 脱离现代性?	(263)
世界舞台的变化	(264)
结束与开端	(269)
改变了的三大范式	(272)
新问题、新流派、新范式?	(283)
结论	(287)
参考书目	(293)
索 引	(326)
译 后 记	(354)

国际关系史学论